

明代贵州汉族移民及其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文生态建构的影响

廖荣谦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明朝政府出于防守云南和开发边疆的目的,通过军事移民、政治移民和商业移民三种方式,使得大量中原汉族移民迁徙贵州。来自各地的移民将其所属的强势文化带至贵州,与本土文化互相碰撞,相互融合,促进了贵州的人文生态的整体建构。

关键词:贵州;移民;人文生态

DOI:10.13603/j.cnki.51-1621/z.2018.09.013

中图分类号:K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785(2018)09-0078-07

贵州的汉族移民由来已久,大致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但真正有史可考的最早的汉族移民,当始于庄蹻入滇。自战国时期庄蹻入滇至元末明初,随着历代王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不断有汉族移民迁入贵州。但总的来说,这些移民大多是伴随着军队征战被迫而来,自发移民极少。同时,由于贵州远离中原政权中心,各代王朝因为各自实力的强弱而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控制力有所不同,再加上各朝统治者对贵州的开发都不够重视,所以迁入贵州的汉族总量不多,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贵州的民族构成成分,在夷多汉少的情况下,这些外来移民为了生存,不得不随乡入俗,变俗易服,最终被少数民族同化,其后裔也被视为少数民族了。明代由于平定云南和固守边疆的战略需要,明朝在贵州派重兵驻守,因卫所的设置而带来了大批从事商屯和民屯的汉族移民。随着外地移民的不断增多,外来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大,不仅使贵州的民族成分发生了改变,也极大地促进了本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使本地的人文生态发生了变迁。

一、明代贵州的汉族移民

明朝初年,云贵大部分地方仍为元朝残余势力所控制,元梁王巴匝剌瓦尔密盘踞云南,依靠部分土司力量负隅顽抗。待扫清中原与北方元朝势力后,朱明王朝着手经营西南边疆地区。在明朝平定云南的战略部署中,朱元璋意识到了贵州“襟川带粤,枕楚距滇”的重要战略地位,因此确定了“先安贵州,后取云南”的战略方针。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开始在贵州驻扎重兵,建立卫所,为收复云南作准备。洪武四年(1371),在贵州设立贵州卫(治今贵阳)和永宁卫(治今四川叙永)二卫,均隶于四川都司,与成都卫和武昌卫形成犄角之势,控制整个西南地区。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任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分别为左、右副将军,率兵三十万,兵分两路往征云南。仅半年时间,明军即平定了云南及贵州境内的元朝残余势力。

为了巩固胜利果实,加强贵州的军事防务,洪武十五年(1382),明政府设立了贵州都指挥使司,建立了贵州历史上第一个省级军事机构。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天下都司卫所,在今贵州设二十四卫、二直隶千户所,分属于贵州都司和湖广都司。贵州都

收稿日期:2018-05-18

基金项目:2016年度贵州师范大学资助博士科研项目“明清时期儒学在贵州民族地区的传播研究”。

作者简介:廖荣谦(1977—),男,湖南隆回人,贵州师范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和民族民间文化。

司领十八卫、二千户所,即贵州卫、永甯卫、普定卫、平越卫、乌撒卫、普安卫、层台卫、赤水卫、威清卫、兴隆卫、新添卫、清平卫、平坝卫、安庄卫、龙里卫、安南卫、都匀卫、毕节卫、黄平和普市千户所^{[1]卷90}。湖广都司领六卫,即镇远卫、平溪卫、清浪卫、偏桥卫、铜鼓卫、五开卫^{[1]卷90}。以贵阳为中心,贵阳以西的为“上六卫”,即威清卫、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普安卫;贵阳以东的为“下六卫”,即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兴隆卫、都匀卫;贵阳西北一线的为“西四卫”,即乌撒卫、毕节卫、赤水卫、永宁卫;湖广都司所属六卫,因地处贵州东部边缘,所以称为“边六卫”。洪武后,历代政府又对贵州的卫所有所调整,将千户所增至 24 个。

按明代军队常规编制,每卫额定 5600 人,千户所额定 1120 人,那么,明初贵州都司所设立十八卫、二所的人数达 10 万之众。实际上,明初驻扎在贵州各卫的军人名额与户口数远远不止 10 万,各卫所具体人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明代贵州各卫所军人数量

卫所名称	原额编制/名	实际户数/户	实际人口/口
贵州卫	5704	2316	5379
贵州前卫	6886	2964	6237
龙里卫	7388	1116	5245
新添卫	5978	2357	21977
平越卫	6975	3105	21979
清平卫	9803	897	2184
兴隆卫	8661	1094	3915
都匀卫	7169	1312	21113
威清卫	5960	6035	13758
平坝卫	5890	1617	6066
普定卫	8864	6565	24470
安庄卫	9976	7876	48857
安南卫	5779	2486	6892
普安卫	30093	2656	6998
毕节卫	6641	2885	6641
乌撒卫	9338	3551	8355
赤水卫	10307	5615	33682
永甯卫	5942	6789	15247
黄平千户所	1129	547	1467
普市千户所	1445	493	1389
合计	159928	62276	261851

(资料来源:原额编制数见嘉靖《贵州通志·兵防》卷四,实际户数与人口数见嘉靖《贵州通志·户口》卷三。)

由表 1 可知,贵州卫所驻兵原额均已超过全国规定的编制数量,总数达 16 万余人,如果再加上隶属湖广都司的六卫,实际户数将达 8 万余户,实际人

口将达 35 万余丁口。按明制,一人在军,必须全家同往,若无妻室,予以婚配。按平均每家 4 口计算,保守估计驻防贵州的军户约有百余万人。明代规定,本籍军户一般不在本地卫所从军,所以这百余万人基本都是从外地迁入贵州的,大多来自于江西、湖广、安徽、江苏、四川等省。

元末明初,全国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流离失所,大量土地荒芜。为了解决如此众多的军人及家属的军饷和温饱问题,朱元璋仿照唐代的府兵制,“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下令奖励屯田垦荒,要求“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在卫所实行军屯制度,兵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1]卷77}。据嘉靖《贵州通志》载:“贵州布政司官民屯田通共四十二万八千六百五十九亩七分五厘三分五坏,五万一千三百五十六椽,陆地通共五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七亩四分六厘一毫。”^{[2]卷3}由于贵州的卫所主要设置在由湖广通往云南和由四川通往云南的驿道沿线,所以屯戍的兵士及其家属基本上都分布在驿道干线周边。

明正德以后,朝廷政治腐败,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卫所制度逐渐废弛,军户大量逃散,据万历《贵州通志》载,万历二十五年(1597)查存贵州都司,仅有 59340 户、184601 丁口,比原额减少了 12933 户、77268 丁口^{[3]卷19}。由于明代对军户管理非常严格,凡列入军籍后,父子相承,不得脱籍,如有脱籍的逃户,必须抓捕回卫,予以重惩,“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军户死若逃者,于原籍勾补”^{[1]卷78}。所以这些逃军只好潜入深山老林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些与当地少数民族结婚成家,成为“汉父夷母”或者“夷父汉母”。未逃散者仍世代屯种,久而久之,遂成土著,如今安顺、平坝、镇宁、长顺一带尚居住有二十余万当时屯戍此地军士的后裔,他们集结而居,成为“屯堡人”,仍保留着明代的语言、服饰、婚嫁、丧葬等习俗,世代相传,与后来迁入贵州的汉族及当地民族均有不同。

明代的屯田,除了军屯外,还有民屯和商屯。民屯的基本原则是“移民就宽乡”,即由国家力量组织稠密地区(狭乡)农民向地广人稀的云贵等边疆地区(宽乡)流动,以解决江南、川湖等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时可以增加开发边疆地区劳动人口数量,最终达到“以夏变夷”,巩固西南边疆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调北填南”、“调湖广填贵州”。洪武六年(1373),太仆丞梁楚仙帖木尔上疏:“宁夏境内及四

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1]卷77}朱元璋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开始了明代边疆地区的屯田。民屯的另一种途径是由政府“招徕游民”或“以罪徙实之”。这两种途径的民屯均由各级官府组织,发给耕牛、种子、农具,而且给予政治优待,耕种三年后才开始纳税。民屯导致大量外地移民迁入贵州,据嘉靖《贵州通志》统计,嘉靖时,贵州布政司所属各府、州、县,民户已达 56684 户,250420 丁口^{[2]卷3},数量仅次于军屯。

由于贵州卫所驻军人数太多,仅凭军屯和民屯解决粮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明初,采取招募盐商于各边地开中的办法,即招募各地商人运送粮食来贵州换取盐引,或者由商人招募农民于贵州开荒,将所产粮食交给各卫所作为军粮,各卫所按所收粮食的数量向粮商发放相应盐引,商人凭借盐引在产盐地区换取食盐销售获利。因贵州素不产盐,贵州的食盐主要来源于四川、湖广、云南以及江淮地区,政府利用“盐引开中”的政策吸引了大量上述地区的商人来到贵州经商,由是商屯大兴。

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六年二月壬辰,贵州卫言:“岁计军粮七万余石,本州及普宁、播州等处发征粮一万二千石,军食不敷,宜募商人于本州纳米中盐以给军食。”从之^{[4]《太祖实录》卷79}。永乐十一年四月丁卯(十九)(1413年5月18日),贵州都司言:“所属卫所储粮不敷,宜如洪武中例开中纳盐、粮。然先定川盐并云南黑盐并每引输米一石五斗,安宁并引二石,今本地米价翔贵,宜减轻募商中纳为便。”从之。命比照初例各减五斗^{[4]《太宗实录》卷88}。景泰元年二月乙未(二十)(1450年4月2日),“命户部于贵州等处召商纳米中盐。淮盐:贵州在城仓每引米二斗,普定等卫仓每引米二斗五升;浙盐:贵州在城仓每引一斗五升,普定等卫仓每引二斗;四川并盐:贵州在城仓每引一斗五升,普定等卫仓每引二斗;云南并盐:贵州在城仓每引三斗五升,普定等卫仓每引四斗”^{[4]《英宗实录》卷189}。“盐引开中”之法作为军屯的补充,有效缓解了明初军中粮食紧缺的问题,减轻了当地民众的赋税负担。正如普安军民指挥使周驥言:“自中盐之法兴,虽边远在万里,商人图利运粮时至,于军储不为无补。”^{[4]《太祖实录》卷197}明代中后期,因官吏的贪腐等原因导致全国盐政废弛,贵州的盐引开中也因此日益萎缩,但因开中所招致的汉族商人群体的数量却是非常庞大的。与此同时,贵州丰富的矿产资源也吸引了大量商人前来开采,如嘉靖《思南府

志》载:“婺川有砂坑之利,商贾辐辏,人多殷富。”^{[5]卷1}此外,铜仁、锦屏的金银矿也非常富足,因黔东北紧邻湖广、巴蜀,有乌江便利的水上交通,故黔东北地区成为当时各地客商的汇集之地,商业非常发达。这些商人中的一部分因为婚姻等原因在贵州定居下来,成为移民的一部分。

冉光芬将明代贵州移民的种类分为四类:军事移民、商业移民、政治移民、自发的流徙民^[6]。可以将上述因军屯而导致的移民归之为“军事移民”,商屯归之为“商业移民”,民屯和受朝廷派遣在黔地任职和遭贬谪入黔的官吏则纳于“政治移民”一类。自贵州设省之始,在改土归流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流官统治的范围,府、州、县等机构经过几番调整,据《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统计,终明之世,贵州布政司领有 10 府,下属 9 州、14 县和数十长官司^[7],贵州都指挥使司拥有 24 卫、2 直隶千户所,朝廷每年都要派遣大量官吏前往任职。冉光芬据民国《贵州通志·职官表二》统计,从永乐十一年建省至明末崇祯间(1413—1643)这二百三十年里,“在贵州任省级机构的文职官员 1137 人,其中总督 27 人,巡抚 83 人,巡按 178 人,布政使 88 人,参政 128 人,参议 153 人,按察使 102 人,按察副使及学政 212 人,分巡道及僉事 166 人。如果加上各府、州、县的各级机构官员、杂役以及各类武官,那么派遣至贵州的流官数量也是比较庞大的”^[6]。按明代职官制度,明代实行异地任官,“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1]卷71}。这些流官主要来自四川、浙江、江西、湖广、江苏、福建六省,虽然这些官吏任满即升迁至他处,但朝廷又会源源不断派遣其他官吏前来,所以这批人也构成了一个流动的移民群体。

在这些流官中有一些身份特殊的人群,这些人因忤逆当朝权贵或得罪上官而被贬谪到贵州,或随父贬谪贵州而后占籍本地。这个群体人数虽然不多,但不乏著名人物,如王阳明、邹元标、张翀等。这些贬官中,有些不久就被赦免或升迁,但也有一些终身没有机会离开贵州,有一些官员退休后定居于贵州,这些人和其后代均构成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乾隆《贵州通志》载:“孔文,圣裔,洪武初以知府戍贵州。卒,子孙遂家焉。”“金镇贵,江南人。以木商采办木料至贵州,会水西苗叛,镇贵尽输商钱助军需有功,历升至总兵。致仕,遂家于开州。”“张伯裕,诸城人。洪武间举贤良方正,知潼关县。以鯁直不阿

谪安顺州吏目,遂家焉。”^{[8]卷32}

随着移民不断增多,外来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大,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汉多夷少”的情况,思南府知府洪价曾说:“入我皇明永乐以来,始革去宣慰氏而设郡立学,于是土著之民无几而四方流寓者多矣。”^{[5]《思南府志后序》}嘉靖《思南府志》载:“府旧为苗夷所居,自祐恭克服以来,芟蕘殆尽。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陕西皆宣慰氏之羽翼,各司正副官与里之长是也,多巨族,负地望,颇以富足夸诈相高。江西皆商贾宦游之裔,多读书,乐仕进,亦渐超于浮薄。”^{[5]卷1}表明各地移民进入贵州以来,仍保留了鲜明的中原主流文化的特色。

综上所述,明代贵州移民的主体部分是军事移民,其次是政治移民,再次是商业移民,大部分是由政府强制迁入贵州的,自发迁徙入黔的移民不多。从移民的民族构成来看,主要是汉族,也包含有少量的少数民族如苗族、回族等。从移民的来源来看,大多来自中原及江南,其中以江西、四川、湖广、江苏、安徽、福建等地为多,也有些来源于山西、山东、陕西等中原地区。从移民的分布范围来看,军事移民和商业移民主要分布于驿道交通沿线地区,而政治移民则主要分布于中央控制的流官统治区域。来自各地的移民将其所属强势文化带至贵州,与贵州本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贵州高原文化。

二、汉族移民与贵州人文生态建构

汉族移民的纷至沓来,使明代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一)汉族移民改变了贵州的人口构成成分

战国时期至元末明初贵州的汉族移民情况表明,这一时期的汉族移民的组成成分主要是政策性移民,其中大多数人为各卫所军屯士卒及其后裔,此外,因罪或得罪权贵而充军发配及应募之人也占有一定比例,汉族移民迁入贵州的规模往往受制于中原政权对这一地区的重视和控制程度。这一时期移入贵州的汉族人口数量相对有限,根本改变不了原有的人口构成成分,甚至有些汉族移民进入贵州以后被逐渐“夷化”,成为新的少数民族,所以这一时期中原的汉文化对贵州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作用与影响尚未达到主导地位。

明代中后期以来,汉族移民对贵州的影响日益加重,除军事移民外,因政治和商业贸易等原因迁入

贵州的汉族人口逐渐增多。据《嘉靖思南府志》载:“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皆宣慰氏之羽翼,各司正副官与里之长是也,多巨族,负地望,颇以富足夸诈相高。”^{[5]卷1}汉族移民的发展壮大,甚至左右了当地的政治力量。《明实录·穆宗实录》载:“其贵竹长官司所辖,皆流寓子孙。”^{[4]卷21}另郭子章《万历黔记·舆图》载:贵州宣慰司“本司隶籍人民,多来自中州”,新添卫“附郭旧人,迁自中州”^{[3]卷4}。据《嘉靖贵州通志·户口》统计,贵州布政司所属各府州县,民户计 66684 户、250420 丁口^{[2]卷3}。这些民户为编入里甲的人口数,而明代少数民族归当地土司所管,尚未编户齐民,所以这个庞大的人口数当为历代汉族移民的后裔,及明代因民屯、商屯及自发迁入贵州的汉族人口。大量中原与江南的汉族移民纷纷涌入贵州,汉族移民的轨迹沿着交通主干道逐渐渗透到边远山区,逐渐改变着贵州的人口构成成分,有些地方汉族人口甚至占据主导地位,出现了汉多夷少的情况。

(二)汉族移民改变了贵州落后的经济结构

元明之际,贵州农业生产最突出的问题是地广人稀,劳动力严重不足,农业技术落后,“贵州山深地僻,非无田之患,而无民之忧”^{[2]卷3}。贵州因逐步吸纳了政策性移民以及自发迁入的汉族人口,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开发力量,不但增加了大批劳动力,而且以人为载体,把中原、江南及邻省的先进生产技术带进贵州,改变了过去刀耕火种的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对贵州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明代前期,由于地广人稀,耕作技术落后,除地形相对平坦的坝子被开垦为农田以外,广大山区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正德年间,王阳明贬谪贵州时,在《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咏言寄怀》中记道:“山荒聊可田,钱镛还易办。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9]牛耕技术在中原地区早已十分普遍时,在贵州却是一种新兴的技术。据史书记载,贵州虽然很早就已经养牛,但并不用于耕田,而是把它作为财富的象征,或作为婚姻的聘礼,或用作祭祀的牺牲。据《嘉靖贵州通志·风俗》记载,苗人“耕不挽犁,以钱镛发土,耨而不耘”。程番府上马桥土人,“耕则不以牛具,以木锹播殖”^{[2]卷3}。自汉族移民将先进的牛耕技术传入以后,牛耕技术渐次推广,这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至明末徐宏祖来到贵州时,交通沿线及坝子周围的土地大都已经

通过牛耕开垦为农田。他在《徐霞客游记·西南游记七·贵州》中记道:从贵阳青崖西北行“两山夹中,夹底平洼,犁而为田”;普安老鸦关西南,“坠壑下盘,丘垤纵横,皆犁为田”^{[10]卷5}。说明至明末时,贵州所属的中洼之地、平旷之区均已“犁而为田”,水田的开垦已由平坝向坡地扩展,凡有水源之地,便尽量开成水田。在缺乏水源、坡度较大的山地,便开垦为土,种植玉米、小麦、豆类等经济作物。

随着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作物种类日益呈现多样化。如明末,玉米、洋芋、小麦、番薯等粮食作物和棉花、甘蔗、烟叶等经济作物随移民一起传入贵州。天津人母扬祖在任绥阳县令时,将黍、稷与小麦等农作物品种带至贵州,四川陈姓汉族移民将大红袍桔子带至兴义地区。种植的多样化改变了贵州地瘠产薄的局面,解决了人们的粮食问题,使得明代贵州人口数量得到大幅度的增长。同时,水利设施有了明显改善,各种用于灌溉的堤坝渐次修筑,著名的如贵州宣慰司的长丰堰、都匀府的胡公堰、龙里卫的纸局坝等,甚至在一些地势较高处还装上了水车。水利设施的修建,改变了以往靠天吃饭的状态,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外,手工业和采矿业也有了新的进展,商业逐渐兴盛起来。如黔东北地区的镇远、思南和铜仁三府,地与四川、湖广接壤,是湘黔驿道的必经之地,河流星罗棋布,水运资源丰富,商业异常繁盛。镇远“当滇黔门户”,云南的货物,如铜、锡等多在此集散,“商贾辐辏于此”^{[11]卷5},来自南京、江西及湖广的大量商人在此结集为市。这些外地商人大多定居于此,专门从事商业活动。思南“上接乌江,下通楚蜀”,为“川贵商贾贸易之咽喉”^{[5]卷1}。陈鼎《滇黔游记》载:“黔中诸郡皆荒凉,惟思南府最盛,有水道通舟楫,货物俱集而人文亦可观,较之石阡、思州有天壤之隔。”思南被称为“商旅之康庄,舟车之孔道”^[12],商业堪称繁荣。《嘉靖思南府志》载:“府旧为苗夷所居,自佑恭克服之后,芟蕪殆尽。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陕西皆宣慰氏之羽翼,各司正副官与里之长是也,多巨族,负地望,颇以富足夸诩相高。江西皆商贾宦游之裔,多读书,乐仕进,亦渐趋于浮薄。婺川有砂坑之利,商贾辐辏,人多殷富。”^{[5]卷1}城中多有“商贾宦游之裔”,又有“砂坑之利”,所以外地商人聚集于此,形成一个商业活动中心。铜仁“郡居辰沅上游……舟楫所商,商贾所集,化行俗美,风景犹类中州”^{[13]卷2}。铜仁不仅水路

便捷,而且物产丰富,当地盛产朱砂、水银,省溪、提溪二司出产黄金,铜仁、省溪二司出产铁矿,商业日渐繁荣。多种经济经营模式的开展,彻底改变了贵州单一的经济结构,同时也改变了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

(三)汉族移民加速了汉文化在贵州的传播

由于汉族移民大多来自于两江、两湖、四川、陕西等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人们自古以来就有优良的读书习礼的习惯。明代政府一方面为满足他们及子孙后代的文化教育和科举入仕的需求,使他们世代能够在贵州安心定居下来,另一方面想通过他们带动少数民族学习儒家文化,达到用夏变夷的目的,于是不遗余力地在贵州推行儒学教育。

明代自洪武时期就按照“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要求各级地方官吏重视教育,并将办学业绩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内容。朱元璋把“移民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定为安边的基本国策,在加强政治、军事统治的同时,通过儒学的教化作用,使边疆少数民族接受封建礼教,从而归顺朝廷。所以,明朝历代皇帝均把推行儒学教育作为巩固边疆的长治久安之策,凡政治力量能达到的地方,皆设学官,建立学校,修建孔庙,开设科举,体现政府“怀柔远人”之意,达到“建学校以化夷”的目的。

明朝派遣至贵州的这些流官,有正式任命的地方政府官员,如蒋廷瓚、万士和、郭子章、徐樾等,也有因触犯权贵而被贬谪流放至贵州的“罪臣”,如王阳明、张翀、邹元标等。他们大都饱受儒学教育,绝大多数是进士或举人出身,而且多数来自中原和江南地区,他们是朝廷在边疆地区统治的重要力量,更是儒学的忠实传播者。他们均能自觉实践儒家的文化理想,通过重文兴教、移风易俗等一系列措施,在执行中央法令的“吏”的功能的同时,又能发挥“师”的教化功能,将儒家大传统逐渐渗透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日常生活之中。他们以振兴贵州文教为己任,极力推动贵州的教育发展,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在贵州的穷乡僻壤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办学热潮。据统计,明代贵州共建官学68所,其中司学8所、府学15所、州学6所、县学12所、卫所学27所。另外,还创办了专门从事讲学的书院47所。学校和书院的兴建,在贵州树立了一股良好的读书向学的风气,为贵州培养了大批儒学人才。明代贵州

共考取进士 172 名(其中武进士 34 名),举人 1793 名(其中武举人 21 名)^[14]。

儒学教育的蓬勃兴起,对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是以学校为中心传播中原文化,包括诗词、医药、历算、蚕桑、农书等在内的汉文化随之兴起,人们纷纷按照中原模式进一步开发贵州。二是在官学和书院的推动下,广大的城市和乡间普遍办起了社学、私塾,文化普及率逐渐提高,甚至在土司地区也出现了一些知识分子,如易贵、田秋及宋昂、宋昱兄弟等。三是土司子弟接收汉文化洗礼后,政治上不断向流官靠拢,对巩固明朝在贵州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也为后来大面积的改土归流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汉族移民促进了当地风俗习惯的变迁

元代末年,虽然中央政权将西南地区纳入元朝的统治,但直至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仍分属邻近的湖广、四川、云南三省。除了在少部分与内地比较接近的地区建立流官统治外,大多数地区则因其社会经济相对落后,且系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只能封赏当地势家大姓作为土官来实现其间接统治。明代承袭元制,仍然实行土流并治的政策。元代在今贵州境内设立大小土司三百余处,明代对其加以归并和改置,但仍有大小数百余家土司。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处于土司统治之下,地理环境极为封闭,所以明代初年,贵州大部分地区还停留在封建领主经济阶段,有些地区甚至还保留着某些奴隶制和原始社会残余,经济文化水平非常原始落后。如都匀府都匀司:“其地近于烂土,春阳多瘴疠。夷性狡猾,不通汉语,率皆草衣木食。出入负刀弩,好斗杀,重财轻命。男女无别。死则杀牛祭鬼,集其种类,击鼓唱歌而乐。”独山州丰宁司仲家:“不通汉语,借贷结绳为记。科头跣足,笼鸡贸易,架楼而居。饮食多不洁,器用与犬豕同。婚姻用牛马,有丧击铜鼓举哀。”镇宁州的少数民族甚至还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2]卷3},风俗习惯还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

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和儒学教育的兴起,当地风俗习惯为之一变。据《嘉靖贵州通志》中记载:“阳明王守仁寓贵时,村村兴社学,处处有书声”;贵州布政司宣慰司“文教丕振,风气和,礼乐文物与中州诸大藩等,王化大行”;宣慰司“洪边宋家其始亦中州裔,久居边徼,衣冠俗尚少同华人,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其于亲长亦知孝友”;贵竹司“风俗淳厚,率多尚礼,以耕为乐,不喜华靡,尤重于婚丧,有中州

遗风”;青山司花仡佬“衣服语言颇有易其习,亦风教之所渐也”;思州府“夷民丕变,颇精儒业”;思南府“渐被华风,饮食言语,素所服习。椎髻之俗,悍劲之性,靡然变易矣”;婺川县“渐知读书”;朗溪司峒人“近来服饰亦颇近于汉矣”;黎平府“衣冠习尚,一同华风”;新添卫“皆读书尚礼,亦知慈孝友恭之善焉”。兴隆卫“成化间,经历李文祥左迁于此,革去淫祀,遏绝浮屠。后郡人布政周瑛崇用朱氏家礼,冠婚丧祭,悉举行之,观感之余,多仿效”。平坝卫杨义司“其民皆苗、佬、仲家,性凶狠,好斗轻死,不知礼义。迩来渐知服役官府,衣服、言语稍如华人矣”^{[2]卷3}。中原移民的到来和儒学的传播,彻底改变了贵州原始的知识传承习惯和风俗习惯,中原移民的文化教育传统和知识结构到明末时,已经成为贵州大部分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形态。

三、汉族移民给贵州带来的负面影响

贵州自古以来便为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大量移民的迁入,客观上丰富了贵州人文生态的内涵,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因素。

明初卫所和屯田制度的设立,大量卫所官兵和外地移民突然进驻贵州,使贵州的人口猛然增加,且卫所和屯田大多分布在驿道干线上,交通便利,地形平坦,如此势必挤占原住民有利的生存空间,使得大量的少数民族只好被迫迁移到交通闭塞的深山老林当中,过着世代贫困的生活。因民屯和商屯而来的汉族移民则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土地而成为地主,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当地少数民族则不断丧失土地,沦为汉族地主的佃户,以地租的形式受到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甚至有些地方官员与土司首领互相勾结,在其统治辖域内,利用手中的特权强占民田,霸占民女,任意残杀土民,对土民实行残酷统治,造成了严重的阶级对立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起义。

明初虽采取了一些控制和稳定贵州地区的措施,但在明王朝建立不久,在一些地区就不断爆发人民反抗斗争。洪武十一年(1378)至十八年(1385),湘、桂、黔边区的侗、苗族人民因屯军侵占田土,又加以沉重的苛捐杂税,逼得当地民众走投无路,在吴勉的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洪武二十四年(1391)十一月,“五开洪州泊里、银濂、巴黄洞蛮作乱,命后军都督佥事茅鼎率长沙、永州、宝庆、衡州、靖州五卫官军,会前军都督佥事何福等讨之”。半月后,又有“五开堂崖诸洞苗蛮作乱”^{[4]《洪武实录》卷214}。洪

武三十年(1397)三月二十八日,林宽领导了古州侗族人民起义。

贵州建省后,明王朝加强了对贵州地区的统治,但由于统治者的压迫、剥削,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永乐十一年(1413)六月,思州台罗等十四寨苗普亮等,及洪江、洪陂等寨苗普罗哲等二千余人进攻镇远、清浪卫,次年初才被镇远侯顾成等镇压下去。宣德二年(1427),水西阿闭妨宜带领八千余人举行抗税运动,宣德五年(1430)八月,乌罗府知府严律己奏称:“所属治古、答意长官司长官石各野等聚众出没铜仁、平头、瓮桥等处,诱胁石鸡娘并箐子坪长官司吴毕郎等作乱。”^[4]《宣宗宣德实录》卷69 他们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明朝的贪官污吏,湘黔边境的苗民均群起响应。嘉靖十八年(1539),由于地方官吏与当地土司狼狈为奸,在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区爆发了长达十多年的人民反抗。隆庆六年(1572),广西怀远瑶族举事,贵州瑶族均起而响应。这次瑶族的反抗斗争规模很大,历时三年之久,明廷震动很大。万历三十六年(1608),阿包、阿牙领导定番州、金筑安抚司一带的布依先民举行武装斗争。四十四年(1616),定番州又以老蜡鸡为首率领布依先民反抗官军。虽然上述少数民族起义在强大国家军队的镇压下均告失败,却极大地动摇了明朝政府在贵州的统治。

虽然移民的大量迁入导致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汉族移民的到来使贵州的人文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贵州的进一步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给该省带了新的生机,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

展。

参考文献:

- [1] 张廷玉,等. 明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谢东山,等. 嘉靖贵州通志 [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 成都:巴蜀书社,2016.
- [3] 郭子章. 万历黔记 [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 成都:巴蜀书社,2016.
- [4] 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 明实录 [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
- [5] 洪价,等. 嘉靖思南府志 [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 成都:巴蜀书社,2016.
- [6] 冉光芬. 明代贵州历史移民与家族伦理变迁研究 [D]. 上海:复旦大学,2010:43.
- [7] 侯绍庄,等. 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 [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263.
- [8] 鄂尔泰,等. 乾隆贵州通志 [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 成都:巴蜀书社,2016.
- [9] 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769.
- [10] 徐宏祖. 徐霞客游记 [M]//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 第五九三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11] 蔡宗建,等. 乾隆镇远府志 [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 成都:巴蜀书社,2016.
- [12] 陈鼎. 滇黔纪游 [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 第二五五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6.
- [13] 敬文,等. 道光铜仁府志 [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 成都:巴蜀书社,2016.
- [14] 廖荣谦. 明代贵州儒学形态研究 [D]. 武汉:武汉大学,2015:140.

The Han Immigrants in Guizhou in Ming Dynast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ity Ecology in Minority Nationalities' Regions

LIAO Rongqian

(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For the purpose of defending Yunnan Province and developing the border areas, the Ming Government made a lot of Han people in central China migrate to Guizhou Province through three ways: military,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The immigrants from various places brought their mighty culture to Guizhou to collide with the local one and fuse into it, which promoted the whole construction of the humanity ecology in this province.

Key words: Guizhou; immigrants; humanity ecology

(责任编辑:王建平)